

试论清代福建乡试对台湾士子的向心力作用

刘一彬

[摘要] 清政府为安抚孤悬海外的台湾士子,在福建乡试的中举名额中特为台湾士子设立了保障名额,并给予赴福建参加乡试的台湾士子以“官送”的待遇,而且在福州设立台湾试馆、会馆安置士子。福建乡试的对台优待办法促进了台湾士子更加热衷于渡海到福建参加乡试,增强了台湾士子对科举考试的向心力,从而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凝聚力的加强。

[关键词] 清代福建乡试;台湾士子;向心力作用

[作者简介] 刘一彬,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08级博士研究生,福建 厦门 361005

[中图分类号] K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434(2011)01-0171-04

一、清代福建乡试对台湾士子的优待政策流变

清政府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平定台湾后,台湾成为福建的一个府,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清末,因此,清代地图集《广舆记》里台湾的全部版图清楚地刻印在《福建全图》里。在这二百多年的时间里,台湾的科举考试完全按照福建省的规定执行,台湾岛内只举行童试及岁、科两试,至于乡试则要到福建贡院应考。

随着台湾生员数量的增加以及台湾绅商为平定太平天国捐输备饷而给予中额奖励,清代台湾乡试举额经过数次的增加,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的取中一名发展到咸丰九年(1859年)戊午科开始的保障名额八名。福建乡试设立台湾士子保障名额有力地推动了台湾地区文风的繁盛和社会的进步。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议定台湾一府三县设学校及学额,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福建提督张云翼上疏建议台湾生员在福建乡试“于闽场另编字号,额中一、二名”,得到了礼部批准,另编字号,额外取中举人一名^{[1](P234-235)}。设立保障名额有力地推动了台湾科举考试的发展,这一年台湾府凤山县人苏峨中举,成为台湾府的第一位举人^{[1](P208)}。据《清会典·台湾事例》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的记载“乡试为抡才大典,出题理宜详慎。……

今览各省所进题名录中,其题目多有未当,如福建三场策问台湾事宜一道,于地方情形事势,毫未通晓,乃茫昧命题,殊为悖谬。”^{[2](P86)}从以上两点我们可以看出,对台湾士子“另编字号”与策问“台湾事宜”体现了福建乡试对台湾士子的照顾与关爱,尽管策问“台湾事宜”不够详慎。

另编字号这一制度实行了十年。到了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出现了“诏以天下各省分上中下三等,均增解额,以福建为中省,增额一十七人为七十一人。”以及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闽浙总督郭世隆认为台湾“至今已历四科,人文日盛”,奏准“于今科乡试撤去另号,通省一体匀中”^{[3](P340)}。此举对台湾士子打击不小,致使其后的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四十一年(1702年)两科都未有台湾士中式者,直到康熙四十四年(1706年)才有王茂立中举^{[4](P39)}。

雍正六年(1728年),为了防止内地冒籍应考,同时鼓舞台湾士子,巡台御史兼提督学政夏之芳具折奏请福建乡试对台湾士子另立字号,与福建内地八府分别。福建巡抚刘世明上疏奏准“请照旧例另编字号,于闽省中额内取中一名,以示鼓励”。所以再次恢复了台湾士子保障名额一名。雍正十三年(1735年),由于台湾人文日益昌盛,福建巡抚卢焯请求再增加一个保障名额,以资鼓励,得到清政府同意。这样,台湾士子在福建乡试中额就有了二个保障名额^{[5](P111)}。乾隆五年(1740年),巡台

御史杨二酉奏准粤籍移民在台考试。次年(1741年),礼部议准闽浙总督德沛的题奏,将粤童另编字号入学,但算入闽生员内,等到数科之后满百名,再另编字号取中一名^{[6](P24)}。这是清代首次正式将台湾粤籍单列算入闽籍名额参加乡试,并议定等满百名后另编字号取中。

嘉庆十二年(1807年),闽浙总督阿林保、福建巡抚张师诚奏称“现在有志观光者不下千百余人,而科举仅准录送二百余名,中额仍止二名。再台湾四县应考文童,近年册报多至三千余人,较之内地大中各县应试童生,不相上下,而进额尚不及内地中县。……俯准将台湾乡试中额,于闽省额定八十五名之外,再加一名,连前共中三名。”^{[7](P219-220)}最后,礼部批复增加台湾府“至”字号举人中额一名,这样保障名额从二名增加为三名^{[8](P5)}。为安抚孤悬海外的台湾士子,“于二百名外,再择文理清通者,酌量增加。”乾隆九年(1744年)议准:科试录取人数,“直隶、江南、江西、福建、浙江、湖广为大省,准其每举人一名,录送科举八十名。”^{[9](P362)}在赴福建参加乡试的台湾士子中,还有一批粤籍士子。道光八年(1828年),闽浙总督孙尔准奏称“台湾道册报粤籍生员现计一百二十三名,已超过百名之数”,且台湾府县“文风加盛,应试之人倍多于百”,“应请于台湾闽籍中额三名之外,另编田字号加设粤籍中额一名”。后经礼部议准,这就是福建乡试中台湾客籍保障名额的由来^{[7](P222-224)}。这样,台湾士子参加福建乡试的举额已增至四个保障名额。

咸丰三年(1853年),由于太平天国运动,军饷急需,所以朝廷对捐献军饷的地方以增加学额作为赏赐,规定“凡绅士商民,捐输备饷,一省至十万两者,准广该省文武乡试中额各一名”。咸丰四年(1854年),议准台湾捐款分闽粤两籍累积,各按十五万两以上加定额一名。次年(1855年)闽籍捐至十万两,加“至”字号永久中额一名。其后陆续有捐助军饷,于咸丰八年(1858年)再加乡试定额二名。至此,台湾乡试的保障名额总共为七名,其中闽籍六名,粤籍一名。到了咸丰九年(1859年),由于福建乡试举额增加了30名,台湾也因此再增加一名保障名额^{[5](P1126-1127)}。因此,连同粤籍的一名保障名额,台湾的乡试举额总数达到八名。

光绪十一年(1885年),台湾单独建省,首任巡抚刘铭传建议仿照安徽士子参加江南乡试的惯例,允许台湾士子仍然到福州参加乡试,取中名额也仍照旧例。

二、清代福建乡试对台湾士子的向心力作用

(一) 奠定了福州在闽台两地的科举地位

福州作为闽、台两地科举教育的中心具有独特的优越地位。按照规定,清代福建乡试每三年一举,加上恩科每两三年举行一次乡试,每两三年就有一批台湾士子到福建贡院应乡试。在各省省会中,这是福州同台湾在历史文化方面特有的一种联系,也是福州对台交流的历史文化优势^{[10](P24-25)}。

据《福建省志·人事志》清代福建举人分区统计表的统计,自清初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200多年间,在福州贡院举行的福建乡试中产生了305名台湾举人^{[11](P125)}。此外,自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凤山县林逢秋(即开台武举人)开始,到光绪十九年(1893年)为止,亦有285位台湾士子在福州考中武举人^[12]。无疑,这些举人无一例外都到福州参加乡试。如根据《钦定学政全书》,各省岁试的具体录取人数及具体各省科试录取数额,福建举人定额85名,科试应取6800名。可见参加乡试的士子与取中的名额的竞争比例往往达到一百比一,所以,实际到福州参加乡试的台湾士子应该在六千名以上。

清代初期,台湾士子到福州应乡试,主要是租赁房屋居住,或者是寄居于同乡好友处。到了光绪九年(1883年),由于台湾文风日盛,每科参加乡试的台湾士子约有800余名,加之福建本土士子齐聚福州,如此多的台湾士子一时难以找到住所。鉴于此种情形,台湾兵备道兼学政刘璈特拨15000两银子在福建贡院附近购地,建造了台北、台南两处试馆,可容纳台湾士子300余人居住。与此同时,台湾的士绅也在福州建会馆,如澎湖绅士蔡继善捐款在福州南台购地,设立了台湾会馆,专供赴福州参加乡试的台湾士子居住。晚清,在福州有云路和天衢两家有名的台湾试馆,就是专为接待台湾士子应考而设立的^{[11](P118)}。

(二) 坚定了台湾士子应乡试艰辛历程的信心

台湾不论隶属福建省或是单独建省,台湾士子须到福建贡院应乡试。在清代交通工具不发达的情况下,台湾士子必须途经台湾海峡搭船渡海到福州,而且期间正值台风高发季节,有些士子经历了九死一生乡试之旅,也有不断发生船翻人亡悲剧的案例。因此,徐宗干的《斯未信斋杂录》记载:书院门前刊石“乡试诸生,小暑节前登舟内渡,过此勿往”。在试院立石“乡试文武生,勿轻出海口,文于

小暑前,武于白露后。”还有人作《渡海万全歌》:“三、四千石新造船,鹿口对渡到蚶泉,三月廿三、四日后,四月初七、初八前。”具体测算何时渡海,何港口对渡最安全^{[13](P69)}。可见,清代台湾士子到福州参加乡试是何等艰辛,是对于学识和勇气何等大的考验。

如《澎湖厅志·卷七·人物》记载:辛齐光,嘉庆六年岁贡,曾应福建乡试十余科,内渡遭风差点丧命。直至其老母亲九十余岁去世,尽完孝道已年近七十的辛齐光服闋再赴秋闱,皓首登瀛,成为癸酉科钦赐举人。蔡廷兰,道光十五年参加福建乡试之后由金门返回遭遇台风,船飘十昼夜,抵达越南思义府菜芹汛登岸,后由陆路返回福建。途经之所与当地士人以诗相酬和,藉以采风问俗,并把其所见所闻,著成《海南杂著》一卷。道光十七年,凯调任台湾道,举充拔萃科。吴文光,工于制义,与蔡廷兰齐名,生性害怕渡海,只参加了一次乡试,虽四书文已入彀,但乡试二场患病不能到场,遂作罢。《彰化节孝册》也记载:杨景生,道光八年赴福建乡试,船破而亡,年仅二十八岁^{[14](P86)}。

还有咸丰二年(1852年),壬子科福建乡试有台湾县学廪生石耀德、施金镛、吴春晖、方金城等四名赴省乡试,遭风溺弊,经抚臣徐宗干奏请给予石耀德等四名训导职衔。同治三年(1864年)甲子正科福建乡试因发“逆窜扰漳郡”推迟至同治四年(1865年)九月间补行甲子乡试,但因“声明考官俟到闽酌定入闱开考日期等因”考期未定,导致台湾诸生稍迟渡海前往福州应考,恰巧这年入秋以来,台风频繁,渡海前来福州乡试的台湾诸生又有四人“遭风淹没”,分别是台湾府学附生黄炳奎、彰化县学廪生陈振纓、黄金城、蔡钟英四人,他们于同治四年八月由鹿港搭乘金德胜商船在台湾海峡遭风沉溺,黄炳奎等四人的尸身日久探捞无获。学政丁曰健奏请援照咸丰四年廪生石耀德等请恤成案,议给训导职衔。于同治五年(1866年)得到礼部批准^{[15](P536-537)}。

清政府为了鼓励台湾士子渡海应考,对中途死亡者追授训导衔。到了同治十三年(1874年),台湾知府决定由淡水港派遣官船统一护送台湾士子到福州参加乡试,此后“官送”成为定例。由于应乡试安全有保障,善后工作处置得当,因此参加乡试的台湾士子人数逐年增加^{[11](P16)}。自康熙廿六年至光绪二十年(1687-1894年)福建乡试开科84科,取中台湾举人251人,其中约有半数不在保障名额之内。

(三)体现了闽台两地崇尚科名的传统

艰辛的福建乡试之旅并不能动摇台湾士子不畏艰辛渡海到福州参加乡试的信心,这与闽台两地普遍重视教育和崇尚科名有关。嘉庆年间,彰化县人梁遇文年过八十,仍然冒着危险,横渡海峡到福州参加乡试。根据清代科举考试的有关规定,凡年过八十者,例由巡抚、学政咨会礼部,奏请授予“钦赐副榜”以上的科名。因此,梁遇文在嘉庆丙子科获得这一科名。同样,参加此科中举的台湾鹿港士子林廷璋和林逊贤叔侄二人年龄却只有十六七岁^{[16](P189)}。可见,参加科举考试获得科名在清代台湾社会具有特殊的魅力。乾隆二十五年至三十五年间(1760-1770年)张士箱子孙六人中举,成为科名最盛的家族。获得科举科名和在社会活动中赢得好名声成为家族拓垦事业十分重要的政治资本。

台湾族人与福建原乡家族在文化教育和科举仕进上的合作,对于促进两地家族的发展和社会地位的提升有着积极意义。因此,无论是福建原乡的族人仕进或是台湾族人仕进,都是这个家族或乡族的荣耀。中举除了必须到祠堂感谢祖先的荫佑之外,还要身体力行,进一步推动举业的向前发展。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在《檐曝杂记》中认为“闽中漳、泉风俗多好多名尚气,凡科第官阀及旌表节孝之类,必建石坊于通衢”。清代福建移民把这种风气带到台湾,台湾的士子一旦获得科名便请著名工匠精选石料,精雕细刻成石旗杆或石坊,凿上姓名生平 and 功名事迹,树于家祠前或交通要道,成为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如台湾连日春(史学家连横之父),咸丰十年(1860年)中秀才,光绪二年(1876年)登丙子科台湾举人。乡试揭榜后,连日春携子回到漳州府长泰县江都村祭祖感恩,在江都村连氏祖祠前竖石笔一对^[17]。

(四)扩大了闽台文化与交谊的影响

台湾士子于乡试之年的小暑前离开台湾,到九月十五日乡试放榜,一般要在福州逗留数月。因此,许多台湾士子会到福州城内和周边地区游览名胜古迹。例如,咸丰九年(1859年)台湾士子陈肇兴横渡台湾海峡到福州参加乡试,之后游历了九仙观、玉皇阁、南法云寺、镇海楼,等待放榜时,又游览了虞公庵、榴花洞、鼓山、涌泉寺等,留下一系列纪游诗。尽管福州如今的许多胜迹,如镇海楼、南法云寺等已荡然无存,但这些纪游诗却成为了解消失名胜极其重要的史料^{[11](P124)}。

著名文学家许地山的父亲许南英曾三次从台湾到福州应乡试。第二次来福州应试期间,许南英

写有《鼓山纪游》：“我昔在家山，曾读《古闽志》：榕城有鼓山，日夕萦梦寐。”。他在这首长诗中，对福州的鼓山情有独钟，赞美鼓山“松柏蔽天青，藤萝缠石翠……百丈流泉飞，一声清磬坠”。细腻的描述中夹杂着真挚的情感，读来令人感动。光绪十一年（1885年）乙酉乡试，许南英第三次来福州参加乡试，当船行至马江口，赋诗曰：“扁舟一棹马江平，席帽依然太瘦生。卖藕小娃犹认得，笑余三度到榕城！”^{[18] (P1-4)}可见，许南英对福州的风土人情十分熟悉，即便是卖藕小娃也倍感亲切。

除游览外，台湾士子在福州还参加了不少会师访友的联谊活动。一些士子，如举人李藩岳和黄宗鼎曾经就学于福州鳌峰书院山长郭柏荫等人门下，他们到福州应考，自然要到老师府上拜访。由于在福州就读，同窗好友也不少，利用应试间隙，会晤学友，畅叙同窗情谊。

（五）促进了台湾士子家族气质的转型

科举考试是闽台文化关系的一个纽带，通过福建乡试的向心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一批祖籍福建的台湾望族实现了由早期移民向士绅阶层的转变。例如，九州出版社出版的台湾“第一家族”传记《雾峰林家》，记录了台中县雾峰林家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可称是台湾近代史的缩影。这一家族，其祖籍地是福建漳州平和县，移民到雾峰后，整个家族尚武，绵延着二百多年的爱国传统，既表现在抵御外来侵略保卫台湾主权方面，也表现在开发建设台岛并无私援助祖国大陆上。从林文钦开始，转从文学入仕，于光绪十九年中举。此人平时乐善好施，凡利人之事，知无不为。因此，从林文钦起，雾峰林家开始接受正统的儒家教育，家族气质渐由武质士绅转变为文质士绅。后裔中林朝宗、林朝崧、林朝璇等纷纷中秀才；林资修、林资铿等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又如，台北大龙峒陈家早先从福建同安迁台，先是经商致富而以“悦记”为家号，从陈维藻起开始转向举业，并于道光五年应福建乡试中举。此后，陈氏家族又有陈维英和陈树篮分别于咸丰九年（1859年）和同治十二年（1873年）中举，陈维英中举后返乡以教化地方为职志，亲掌仰山书院、学海书院外，并竭力提振文风，对北台的传统教育、文化有着极大的影响力，时人尊称为“陈老师”，因而其祖宅亦称之为“老师府”^{[19] (P18)}。这些望族的转型，使得台湾出现了较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士绅阶层。台湾作为农垦社会的色彩开始淡化，文治社会开始形成，这些得益于科举考试对台湾士子向心力作用的积极影响。

（六）淡化了不同地区移民的乡籍观念

清代福建乡试的向心力作用还表现在淡化了在台湾来自福建各个不同地区移民的乡籍观念。台湾各地移民的后代，通过接受科举教育，参加科举考试，产生了许多有功名的人物，推动了台湾文教事业和社会的发展。有功名的士绅更容易接受中国传统文化和闽台一体的观念，促进闽台两地的文化交往。曾几何时，在台湾的闽南人一度械斗较为严重，这是因祖籍泉州和漳州的移民存在着明显的地域观念所致。一些祖籍福建的台湾望族中有功名的士子便努力地化解地域界限，呼吁放弃械斗，致力于发展文教事业，共同促进台湾社会发展。例如，板桥的林维源和林维让兄弟、大龙峒的陈维英在这方面发挥了不少作用，促进了台湾社会的安定和进步。

【参考文献】

- [1] 高拱乾. 台湾府志·卷十 [M]. 台北: 大通书局, 1997.
- [2] 清会典·台湾事例 [M]. 台北: 大通书局, 1995.
- [3] (清) 谢金鑾. 续修台湾县志 [M]. 台北: 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 1960.
- [4] 简钰珣. 清代台湾地区进士及举人研究 [D]. 台湾师范大学, 2001.
- [5] 昆岗.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348卷·礼部·贡举 [M].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92.
- [6] 清高宗实录选辑·第一辑 [M]. 台北: 台湾文献丛刊第186种.
- [7] 台案汇录丙集·卷六·礼部 [M].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81.
- [8] 清仁宗实录选辑 [M]. 台北: 大通书局, 1987.
- [9] 刘海峰, 李兵. 中国科举史 [M].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04.
- [10] 汪毅夫. 中国文化与闽台社会 [M]. 福州: 海峡文艺出版社, 1997.
- [11] 黄新宪. 闽台教育的交融与发展 [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3.
- [12] 李厚威. 涉台至深的闽都科举文化 [N]. 福州晚报, 2009-04-07.
- [13] (清) 徐宗干. 斯未信斋杂录 [M]. 台北: 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 1960.
- [14] (清) 吴功德. 彰化节孝册 [M]. 台北: 成文出版社, 1990.
- [15] (清) 丁曰健. 治台必告录·卷七 [M]. 台北: 大通书局, 1984.
- [16] 连横. 台湾通史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 [17] 陈支平. 从碑刻、民间文书等资料看福建与台湾的乡族关系 [J]. 台湾研究集刊, 2004, (1).
- [18] (清) 许南英. 窥园留草 [M]. 台湾文献馆, 1994.
- [19] 尹章义, 陈宗仁. 台湾发展史 [M]. 台北: “交通部观光局”, 2000.

【责任编辑：周志华】